

## 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

潘小童

**[摘要]** 鄭觀應能成為引領西學東漸的思想先驅，離不開他對英文的熟練掌握。鄭觀應放棄科舉、赴滬學賈之時，就利用夜間的空餘時間，於1866年到1868年5月20日期間在英華書館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學習。傅蘭雅的嚴謹態度和他對傳播西學的熱情，使鄭觀應獲得了優質英文教育及西方文化熏陶，不但為他開闊國際視野、掌握西學知識奠定了基礎，也提高了他對教育的重視。在這段交往中，鄭觀應對中西方文化的適應與融合體現出了一種雙重性，他既努力為國家自強尋找出路，又在與西方的接觸中找尋超越性的價值。

**[關鍵詞]** 西學東漸 英華書館 傅蘭雅 鄭觀應

在晚清時期，出現了一批新興精英人士。他們以商人、買辦、記者、政治活動家等為主，擁有扎實的英文基礎和豐富的涉外工作經驗，因此得以與傳統統治精英中具有改革意識的官員建立合作關係，甚至還與關心中國改革的來華傳教士產生聯結。鄭觀應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積極學習和吸收西學，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圍繞“富強救國”提出了引入西方君主立憲制度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一系列思想，這些都深刻地影響着當時的中國社會。而他的英文能力與西方文化的習得，來源於他早期與傅蘭雅（John Fryer）相處兩年的學習經歷，這段交往成為了他的西學啟蒙之一。

有鑑於鄭觀應在晚清中國的重要性，他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這些關係無疑對他的人生歷程和事業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對其社會關係的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對於鄭觀應的社會交往研究，目前學術界已經有了不少成果。除了對鄭觀應社會網絡的綜合性研究之外，<sup>①</sup>對於鄭觀應與具體人物的交往也是研究的重點，如鄭觀應與王韜、<sup>②</sup>盛宣懷、<sup>③</sup>孫中山、<sup>④</sup>梁啟超等之間的交往，<sup>⑤</sup>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他們與鄭觀應之間的思想交匯與比較，

**作者簡介：**潘小童，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研究生。

<sup>①</sup>邵建：〈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博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12年；李志剛：〈鄭觀應與中外基督教人的交遊及對傳教的主張〉，《嶺南文史》（廣州），第3期（2002），頁59—63；易惠莉：〈鄭觀應與他的家族〉，《嶺南文史》（廣州），第3期（2002），頁68—74；等等。

<sup>②</sup>蕭永宏：〈王韜與鄭觀應交往論略——兼及王韜對鄭觀應思想之影響〉，《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5期（2016），頁244—255。

<sup>③</sup>邵建：〈鄭觀應與盛宣懷關係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2期（2014），頁121—129。

<sup>④</sup>周冬梅：〈鄭觀應的女子教育觀：兼與孫中山的女子教育觀比較〉，《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淮北），第2期（2004），頁139—141；邵建：〈鄭觀應與孫中山關係再討論〉，《社會科學》（上海），第3期（2014），頁158—163；等等。

<sup>⑤</sup>周輝湘：〈鄭觀應並未出賣梁啟超〉，《衡陽師範學院學報》（衡陽），第3期（1992），頁72—73；周輝湘：〈鄭觀應與梁啟超的一樁公案〉，《歷史教學》（天津），第6期（1996），頁47—48；等等。

以及透過人物交往對鄭觀應與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進行探討。

然而，在現有的相關研究中，由於資料有限，對於鄭觀應早期交往經歷介紹較少，並且大部分乃是包含在綜合性研究當中一筆帶過，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次，現有研究較多偏重於他與國內人士的交往，而探討鄭觀應與外國人士之間關係的研究相對較少。此外，在對於鄭觀應早期交往的研究中，較多集中於寶順洋行的買辦經歷對他的影響，而同時期他在英華書館中受到傅蘭雅的影響則常常被忽略。因此，在結合中、西方文獻史料的基礎上，藉由考察鄭觀應與傅蘭雅之間的交往經歷，尤其是鄭觀應早期在英華書館夜校的學習經歷，以此探究鄭觀應早期西學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對於多方面、深層次地完善鄭觀應研究是有必要的。

## 一、鄭觀應的入學背景與時間考證

咸豐八年（1858），時年十七歲的鄭觀應童子試落榜未中。之後，鄭觀應奉其父命赴滬學買，隨後進入寶順洋行，開啟了他的買辦生涯。這段從咸豐九年（1859）到同治七年（1868）的洋行經歷，不但成為他學習商業知識的渠道，而且透過入學，他接觸到了許多外國人，為他接觸與瞭解西學打開了一扇啟蒙的大門。

### （一）鄭觀應入學的原因及背景

進入寶順洋行開始買辦生涯，這對鄭觀應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寶順洋行在中國享有盛名，它是自上海開埠以來就進入上海的十一家洋行的其中之一，而寶順洋行中的優秀人才及競爭機制，都在督促着他不斷學習進取。勤奮好學的鄭觀應開始試圖突破，而此時的上海作為一座“江海通津，南北冠蓋往來，群萃旅處”的城市，<sup>①</sup>為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於是，鄭觀應在傅蘭雅擔任校長的上海英華書館（Anglo-Chinese School）學習了兩年英文。<sup>②</sup>

鄭觀應之所以選擇英華書館，有兩大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當時可供選擇的學校不多。20世紀60年代正是上海英文培訓學校開始發展的時期，隨着外國洋行在口岸不斷建立，出現了大量中英文買辦的需求，隨之也刺激了一批專教英語學校的產生。最早建立的是大英學堂，於1864年6月創辦。傅蘭雅主持的英華書館於1865年創辦，由傳教士和上海當地的士紳共同贊助，其目標群體是商賈階層的子孫，是第一所強調英語教育的傳教士學校。<sup>③</sup>但是在兩所學校中，大英學堂的招生對象是十到十四歲的幼童，並不適合鄭觀應就讀。事實上，英華書館日班的學生年齡也有限制，第一年限制在十到十三歲，第二年放寬到十到

<sup>①</sup> [清]鄭觀應：〈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3。

<sup>②</sup> 上海英華書館是由聖公會在華開辦的一所學校，也譯作“英華書院”，其主要目的是針對官僚及富商的子弟開設英語教學課程。傅蘭雅自1865年至1868年5月20日在此擔任校長一職。

<sup>③</sup> Wu, Guo. *Zheng Guanying: Merchant Reformer of Late Qing China and His Influence 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a Press, 2010, p. 23.

十八歲。<sup>①</sup>但書館的夜班專門針對白天因工作無法上課的職工，因此在當時的學校中，傅蘭雅主持的英華書館更符合鄭觀應的需求。

其次是學校的地址。英華書館幾經易址，在傅蘭雅主持時期，書館位於漢口路接近福建路的部分，<sup>②</sup>距離在黃浦灘邊顛地所租借地區最南端的寶順洋行不遠，<sup>③</sup>也方便鄭觀應在上班之後前往書館學習。

英華書館的學習經歷，無疑為鄭觀應後來西學思想的形成創造了環境。在《易言》的自序中，鄭觀應就提到了自己在這段時期經歷的思想轉變。他在上海時，“達人傑士往往獲從之遊，與之周旋晉接。竊聞時論，多管大計”。<sup>④</sup>可以看出，當時的上海不但具有優越的基礎設施及商業環境，更重要的是，上海既受到西方的影響，又深深扎根於中國傳統文化，最終形成了一個開放、轉型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培養出了許多像鄭觀應、馮桂芬、王韜等一樣對西學開始改觀、並將中國文化轉型與西學傳播相結合的人士。

鄭觀應僅在英華書館夜班學習了兩年，但並非出於其對課程或學校的排斥，而是出於經濟原因。英華書館一共有 22 位日班學生及 20 位夜班學生，學費為每人每年五十兩銀子。<sup>⑤</sup>而作為寶順的低級僱員，鄭觀應當時的月薪大約在十元左右。<sup>⑥</sup>顯然，書館的學費對他而言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即便如此，他仍然在白天繁重的工作後，繼續堅持前往夜校學習兩年，可見他從青年時期便有勤勉學習的心，也可以看出此時鄭觀應已經深深地感受到通曉英文的重要性。此外，雖然英華書館的主要目標是英文教學，但鄭觀應沒有滿足於僅僅學習英文。在英華書館夜校就讀期間，他“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sup>⑦</sup>可以看出，面對當時中國內憂外患、民族危亡的景況，鄭觀應在當時已經開始思考和尋找救國之道了。

總之，在寶順洋行的這段早期買辦生涯，不但鍛煉了他作為買辦的商業技能，同時也為他瞭解西方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洋行內的工作需要及各路人才都促使他不斷學習。這也造就了鄭觀應在此期間對西學抱有一種開放的心態，為他後續能在通曉西文的基礎上瞭解西方政治學說鋪平了道路。

## （二）鄭觀應入學時間考據

對於鄭觀應在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文的具體時間，目前學界還未有準確定論。鄭觀應入讀英華書館一事，大部分文獻都模糊處理、一筆帶過，即使有明確時間，對他在書館就讀的起始時間也不統一。

<sup>①</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3。

<sup>②</sup>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y 6, 1930.

<sup>③</sup> 吳乾兌：〈鴉片戰爭與上海英租界〉，《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0），頁 45—59。

<sup>④</sup> [清]鄭觀應：〈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3。

<sup>⑤</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3。

<sup>⑥</sup> 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 年，頁 6。

<sup>⑦</sup> [清]鄭觀應：〈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04。

部分文獻誤將鄭觀應入讀英華書館夜校的時間與其進入寶順洋行的時間相混淆。例如，夏東元編著的《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中，在咸豐十一年（1861）及咸豐十二年（1862）都提到了“從英華書館傅蘭雅讀英文夜校”，<sup>①</sup>而後在同治七年（1868）中提到“鄭在寶順後期與廣東高要人梁綸卿一起到傳教士傅蘭雅所辦的英華學館夜班學英語，並繼續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sup>②</sup>二者顯然有矛盾之處。實際上，鄭觀應是在寶順洋行工作後才進入英華書館。從鄭觀應自身條件來分析，他初到上海時應是隨其叔父鄭秀山學習英文，他應是在洋行工作中認識到不斷加強英文的重要性，才萌生出更進一步學習英文的想法，因此他在剛剛到達上海之時便進入英華書館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對於鄭觀應在英華書館的學習時間，也有持與傅蘭雅主持英華書館同時期觀點者，即學習時間在1865年至1868年期間。<sup>③</sup>此種說法的確合情合理，但還可以進一步精確。根據鄭觀應的自述，他“約梁君綸卿入英博士傅蘭雅先生英華書館夜課，只讀英文兩年”、“長從英博士傅蘭雅學習英文”。<sup>④</sup>而傅蘭雅作為英華書館的第一任校長，其主持書館擔任的時間為1865年至1868年5月20日。傅蘭雅在1865年才接受聖公會的工作，成為上海英華書館第一任校長。同年7月12日，《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以及《上海新報》開始刊載英華書館的招生啟事。<sup>⑤</sup>換言之，上海英華書館於1865年才正式開設，因此鄭觀應入學時間不會早於1865年。三年後，傅蘭雅接受了江南製造局的工作，而製造局給的最後期限是在1868年5月20日必須到崗。另外還有兩點佐證，在5月30日的信件中，傅蘭雅明確提到“英華書館已經解散”，並且自6月開始，傅蘭雅書信抬頭就已不再是“英華書館”。因此，1868年5月20日可以看作他作為英華書館校長任期的終點。

那麼，在傅蘭雅主持英華書館期間，鄭觀應又是何時進入夜校進修的呢？根據傅蘭雅在1867年7月5日給聖公會的第二份英華書館報告，他曾提到夜校是“在去年開辦”，<sup>⑥</sup>即1866年才開設了夜校。他還提到，比起教育平均年齡在15歲左右的日班小孩，教育夜班的成年人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夜校開班六個月後曾一度暫停，但在此之後，在白天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提出了重開夜校的請求。可見，英華書館最初僅設有白天的課程，後來才為針對鄭觀應這類白天工作、只有夜間有閒餘時間的人士開辦了夜校，而這樣的夜校於1866年才首次開班。因此，鄭觀應進入夜校的時間不會早於1866年。綜上所述，鄭觀應在英華書館學習的時間應為1866年到1868年5月20日期間。

<sup>①</sup>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0—21。

<sup>②</sup>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7。

<sup>③</sup>如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8—39；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23—224；Wu, Guo. *Zheng Guanying: Merchant Reformer of Late Qing China and His Influence 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a Press, 2010；等等。

<sup>④</sup>[清]鄭觀應：〈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04。

<sup>⑤</sup>“Anglo-Chinese School.” *The North-China Herald*, September 16, 1865.

<sup>⑥</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99。

## 二、上海英華書館的教學質量

由於鄭觀應早期生涯的資料相對較少，相對詳細的記載也不過是其晚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中對早年經歷的一段自述。因此，他在英華書館學習的詳細情況難以考據。但幸運的是，傅蘭雅在英華書館教學期間，留下了一系列的書信及報告，收錄在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所整理的《傅蘭雅檔案》（*The John Fryer Papers*）中，這讓我們得以從中探究鄭觀應的夜校學習經歷。

### （一）傅蘭雅的教學理念

提起傅蘭雅，我們更容易聯想到的是他晚清著名翻譯家的身份。傅蘭雅的確用翻譯西方著作的方式推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但除此之外，他也在推動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曾在 13 歲時進入聖雅各學校（St. James School）就讀並成為實習教師，在 18 歲時就讀於海伯利學院（Highbury College）並獲得教師證書。<sup>①</sup>他的師範學習經歷為他來華鋪平了道路，也正是由於他的教師身份，他得以指派到香港聖保羅書院擔任校長，兩年後又成為北京同文館的英文教師，自 1865 年起又前往上海擔任英華書館校長一職。因此，在主持英華書館之前，傅蘭雅從學習和實踐中都已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這也為英華書館的教學質量提供了保障。

英華書館之所以能培育出眾多優秀人才，主要歸功於當時的書館負責人傅蘭雅。首先，他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不會因為學生家庭背景而有所偏待。根據他的記錄，書館的 35 名學生中，大多數是來自廣州、寧波等地的官宦或富商的子弟，其中來自香山的高達 14 位。但不論學生是來自官商家庭還是來自普通家庭，傅蘭雅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甚至還為因五十兩學費而被拒諸門外的中下層子弟着想，代表他們向聖公會致信，以期能得到聖公會的幫助。<sup>②</sup>在給聖公會的第二份報告中，傅蘭雅詳述了學生的情況，並提出因為不加甄別地收錄學員，導致招進了一些智力不足而完全無法理解英語的學生，或者是由於缺乏早期管教而觀念錯誤、懶惰成性的學生；相反，每年五十兩銀子的高昂學費導致只有富裕階級的學生可以進入學校，而一些勤奮的中下層子弟則因此被拒諸門外。由此，傅蘭雅對聖公會提出建議，希望可以重新考慮這種導致濫竽充數的學生和排斥中、下層階級的制度，以便確保進入學校得到教育的人是最有資格、最值得的人。

儘管由於資金有限，學校的設施條件較差，曾經發生過因校舍無力修繕而三次遭到盜竊，以及無法及時為老師發放工資的情況，但傅蘭雅並沒有為了追求賺取更多學生的學費而一味地擴招，反倒是為了教學質量考慮，希望拒絕一部分未達標學生的入學。因此，傅蘭雅來中國的目的並非發財致富，而是在解決自身生存問題的基礎上幫助中國人民。

<sup>①</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

<sup>②</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01。

在傅蘭雅對於英華書館的報告中，他提到夜班的學生“大多為成年人，他們非常刻苦努力，但是他們的進步仍比不上更年輕的日班學生”。<sup>①</sup>既然傅蘭雅對夜校學生不大看好，作為夜校學生的鄭觀應是否長進不大呢？

事實上，傅蘭雅對於學生的評判標準向來異常嚴苛。格致書院聘請的教師來門義（Edmund R. Lyman）在日記中寫到：“傅蘭雅博士告訴我英華書館的學生英文很糟，但我發現根本不是這樣的。這些中國男孩比美國高中的學生水平還要高……總體來說，我很滿意這些孩子的表現。”<sup>②</sup>可見，傅蘭雅用極高的標準來要求學生。此外，傅蘭雅的學生成就頗高。王韜曾寫到，聖保羅書院“皆有子弟肄業，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國家用”。<sup>③</sup>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傅蘭雅夫人整理的傅蘭雅成就資料中，提到他在聖保羅書院教導的學生“現在幾乎全是中國各個部門的領導”，其中有美國公使、西班牙公使、西印度公使、著名律師、李鴻章首席秘書、商業精英、輪船招商局的主要領導等。<sup>④</sup>

雖然傅蘭雅對其學生要求嚴格，但對於他所欣賞的學生，他並未吝嗇對他們的讚美。在英華書館期間，他曾在兩封信件中對書館的四位學生給予了讚賞，<sup>⑤</sup>只是他從未提及這四位學生的姓名。那麼，究竟是怎樣的學生才能被傅蘭雅反覆誇讚呢？在他剛剛接受製造局的翻譯工作、準備從英華書館離開時，他觀察到了一種現象，即“在有智慧的中國人中間開始形成了一種趨勢，他們對外國政治、科學及觀念越來越感興趣”。<sup>⑥</sup>可以看出，他對於關注西學的中國人非常認同，這也和他畢生所期望成就的目標相一致，即在中國傳播西方的知識及觀念。綜上，我們從當時傅蘭雅對“聰慧的人”的定義，結合鄭觀應對於自己在校時的“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的自述，可以合理推測鄭觀應當時與傅蘭雅的交流應該不會僅限於英文教學，還涉及了文化層面的交流。<sup>⑦</sup>

總而言之，傅蘭雅對於學生的評判標準非常嚴格，即便是他認為進步緩慢的學生，實際上也都收穫頗豐，傅蘭雅的教學也為他們之後成為各行各業的人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雖然對於鄭觀應與傅蘭雅的具體交流內容缺乏翔實的史料，但不可否認的是，鄭觀應後來能熟諳英文，並在其日後的交往與閱讀中熟練運用英文，一定與傅蘭雅的悉心教導息息相關，英華書館的經歷也為鄭觀應日後借用西學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鋪平了道路。

## （二）西式教育理念之啟蒙

在英華書館，鄭觀應接觸到的不僅僅是有關英文語法、口語、閱讀等知識，同時還有與當時中國私塾的填鴨式教育不同的西方教育理念，以及對西學的初步瞭解。

<sup>①</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45。

<sup>②</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2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83。

<sup>③</sup>〔清〕王韜：《漫遊隨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60頁。

<sup>④</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3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0。

<sup>⑤</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89、316。

<sup>⑥</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56。

<sup>⑦</sup>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鄭觀應作為中國圖書館改革的先驅，他先進的圖書館思想來源於與傅蘭雅的討論。見 Liao, Jing. “The Genesis of the Modern Academic Library in China: Western Influences and the Chinese Response.”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9, no. 2, 2004, p. 165。

從鄭觀應的角度出發，他的勤奮好學和對救國的渴望促使他主動學習西方的語言及觀念，但英華書館是一所以英文教學為主要目標的學校，作為校長的傅蘭雅是否會傳授西方知識？答案是肯定的。傅蘭雅從小便對中國感情深厚，自從傅蘭雅來到中國之後，其志向就是在中國傳播西學，他“半生心血，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自強自富”。<sup>①</sup>在英華書館擔任校長期間，傅蘭雅還兼任《上海新報》(*Shanghai Chinese Newspaper*)的編輯。無論是校長還是編輯，這兩份工作不但讓他熟練掌握中文，也讓他充分意識到了中國的相對落後。1867年，當恭親王奕訢上奏同文館、準備開設天文算學館時，傅蘭雅在信件中連續兩次提及“中國開始覺醒了”、“中國很快就會加入到國際性的文明競爭中”，<sup>②</sup>他也在日記中提及“中國人渴望瞭解外國知識”，<sup>③</sup>顯示出傅蘭雅對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關注，以及希望西學能在中國得以傳播的迫切之心。

此外，傅蘭雅在其就任英華書館校長的過程中，曾多次在信件中抱怨這份工作。傅蘭雅對職務感到厭煩的負面情緒，是否會導致他對於學生不負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種負面情緒更多來自於他與聖公會之間的衝突，而他本人對於教育是十分重視的，不會輕易將負面情緒帶進工作中。

一方面，傅蘭雅與聖公會之間存在着傳教方式及辦學理念上的矛盾。實際上，他就任英華書館校長這件事情並非完全出於他的自願。在他就任英華書館之前，傅蘭雅受聘於北京同文館，負責英語教師一職。但由於聖公會不滿傅蘭雅的新婚妻子，從而無法接受傅蘭雅擔任差會代理，而傅蘭雅則對聖公會不顧自己的請求，將發生在他妻子身上的不幸之事公開而憤怒，<sup>④</sup>雙方因此產生了矛盾，傅蘭雅期望繼續留在北京同文館的請求也被聖公會拒絕。迫於聖公會的壓力，他一直無法找到更加合適的工作。在1865年7月4日的信件中，他提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邀請，擔任一年的校長”。<sup>⑤</sup>因此，傅蘭雅於1865年進入英華書館擔任校長一職。

擔任校長之後，傅蘭雅與聖公會的矛盾並非就此結束，反而不斷深化。因為除了私人生活方面的矛盾，傅蘭雅與聖公會之間最根本的矛盾，即教育理念上的差異。英華書館作為聖公會創辦的學校，其目標之一就是向學生傳播基督教。傅蘭雅最初來華的確是出於傳教的目的，但是在傳教的途徑和節奏上有着與聖公會不一樣的想法，他擔心過分強調基督教會嚇跑中國學生，所以更希望能夠循序漸進地傳授，但聖公會卻覺得這是他過於世俗的

<sup>①</sup> 傅蘭雅於1892年《格致匯編》語，轉引自楊珂：〈從“傳教士”到文化使者〉，碩士論文，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

<sup>②</sup> (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99—300。

<sup>③</sup> (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55。

<sup>④</sup> 1864年夏天，傅蘭雅安排其未婚妻安娜·羅勃斯頓小姐經陸路來華完婚，但她在途中不幸被船長下藥強暴。雖然聖公會對此事表達了同情，但卻指責傅蘭雅與“基督本性發生動搖的人匆忙完婚”，並藉由“無法接受一個妻子行為不檢點的人做外貿差會的代理”將其開除。傅蘭雅也在與聖公會的信件往來中提及“科里布先生在中國和英國散佈其帶有偏見的謠言，而事實是我妻子是被船長施以強烈春藥後成為犧牲品的”，這也是雙方矛盾的根源所在。參考(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8—230。

<sup>⑤</sup> (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27。

表現。正是這個矛盾，導致了聖公會一直沒有與傅蘭雅簽訂長期合同。<sup>①</sup>對此，傅蘭雅向聖公會表示過這種不穩定性給他的教學帶來負面影響，他也譴責聖公會在是否長期聘用他的事情上猶豫不決，並在多封信件中提到對失去工作的恐懼。這也成為傅蘭雅最終決定辭去校長一職、轉向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傅蘭雅始終非常重視中國人的教育問題。首先，對於傳播西方觀念和基督教教義的目標，傅蘭雅雖然最終選擇了用翻譯西學著作的方式來實現，但他並沒有否認教育是一條好的途徑。雖然他在信件中對工作有所抱怨，但他也在信中多次表達對留在學校的渴望，也不止一次提到希望能出版一套適合中國人學習英文用的教科書。因為在他看來，老師這一職業能對學生產生長久且深遠的影響，這種成就感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其次，在他即將離開英華書館之際，面對不確定的未來選擇，他曾認真考慮過在上海以新的原則創辦一所學校。雖然當時時機並不成熟，但他日後確參與了格致書院的創辦，並與王韜一同主持了命題課士。在晚年，傅蘭雅雖已定居美國，但仍心繫中國教育事業，尤其是上海的盲童，因此大力推動了上海盲童學校的建立。

此外，他與學生的關係向來比較密切。1865年，因為與聖公會的矛盾不得不放棄回到同文館之後，他在香港聖保羅書院擔任校長時的學生曾給他去信，以安慰和鼓勵他。<sup>②</sup>儘管他對於香港聖保羅書院學生的第一印象是“難以與他們交流”、“無論發生甚麼他們的反應都很冷漠”，但在教學過程中，他“在上帝的幫助下克服了語言的困難，並找到了打通學生心靈的方法”。<sup>③</sup>因此，當他的兩年任期到期後，他看到了自己努力後的成果，與學生之間建立的良好關係也使得他對於離職表示遺憾和傷感。正因為他對學生始終保持耐心和愛心，否則他不會在離開香港兩年後仍與學生有往來，並且形容自己和這三位學生的關係“像兄弟一樣”。

綜上所述，傅蘭雅對於這份工作的不滿，雖然確實有一小部分是來自於因學生進步緩慢而產生的挫敗，但更多的是與聖公會之間傳教觀念的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職業不穩定性和對未來去向的糾結。換言之，比起學生和教育事業本身，生活的不穩定與前景的迷茫更多地引起他的負面情緒。因此，他對於英華書館校長一職的抱怨，並不代表他對學生不認真盡責，也不意味着他對教育事業毫無興趣。相反，傅蘭雅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將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思想觀念傳播給中國人，並藉由傳播西學來突破中國人陳舊的思想觀念，甚至晚年定居美國後仍然心繫中國，在上海捐贈土地及錢財，大力推動上海盲童學校的建立和發展。

<sup>①</sup> Bennett, Adrian Arthur.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8-9.

<sup>②</sup> (美)戴吉禮 (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3。

<sup>③</sup> (美)戴吉禮 (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2—213。



### 三、傅蘭雅對鄭觀應的影響

在英華書館的學習經歷，可以說為鄭觀應日後更好地瞭解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礎。其中，傅蘭雅給鄭觀應的影響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在英文上的教育，使鄭觀應可以熟練地運用英文進行閱讀與溝通，為鄭觀應後期與外國人士交流、汲取西學知識打下了基礎。其次，鄭觀應在英華書館的這段經歷極大地加強了他對於教育的重視，使他認識到培養近代化的新式人才是中國教育的當務之急。

#### （一）鄭觀應的教育觀

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主要內容可以總結提煉為“廢八股、倡西學、興學堂”。<sup>①</sup>他深知舊式私塾與科舉制度無法培養和選拔出新式人才，因此他致力於改變傳統科舉制度，並引進西方教育機制，以建立中國新式學堂。可見，這三者是緊密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在《盛世危言》中，鄭觀應認為“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sup>②</sup>鄭觀應將“講求學校”放在致富自強之道的首位，可見他認為教育對於國家自強的基礎性和重要性。

晚年時，當鄭觀應回顧自己一生，首要囑咐其子孫的仍然是教育。根據其自述，他“……入英博士傅蘭雅先生英華書館夜課，只讀英文兩年，可知當日貧讀之難”，<sup>③</sup>可見鄭觀應直到晚年，仍然對因為經濟原因無法在傅蘭雅處更深入地學習而深深遺憾。鄭觀應並非單純地回憶初入社會時的艱難，他引用這段經歷更多地是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夠珍惜“今日讀書不需籌款”的環境，“自應憤勉，毋負光陰”。<sup>④</sup>除了勉勵他的兒子以外，對“凡諸弟來滬學習商務者，我無不囑其先入英文學堂”，<sup>⑤</sup>可見他將英文教育也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上。

鄭觀應在教育方面更多是提出先進的思想理念，但鄭觀應仍然盡自己所能在密切關注及實際推動中國的教育改革。當留美幼童因多方原因被清廷下令撤回後，鄭觀應一方面給帶領幼童回國的容閱贈詩，另一方面也在著述中感歎“全數遣回，甚為可惜”、“何至淺嘗輒止，貽譏中外”，<sup>⑥</sup>以表示對此事的惋惜以及對清廷做法的不滿。

鄭觀應也身體力行地將精力傾注在教育事業之上。他曾長期擔任招商局公學的駐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務中學的名譽董事，還為《英國報律》（*British Press Regulations*）的翻

<sup>①</sup>王學明：〈試論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第2期（1996），頁77—80。

<sup>②</sup>[清]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1。

<sup>③</sup>[清]鄭觀應：〈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483。

<sup>④</sup>[清]鄭觀應：〈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483。

<sup>⑤</sup>[清]鄭觀應：〈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483。

<sup>⑥</sup>[清]鄭觀應：〈考試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96。

譯提供了重要的資金贊助，並專門為此作了一篇序。<sup>①</sup>此外，傅蘭雅和徐壽於 1876 年合力創辦了格致書院，其目的是“向中國人提供關於外國的知識，從而促進中外友好關係”，<sup>②</sup>對此鄭觀應也曾大力支持。在格致書院創立之初，鄭觀應就成為 34 名常捐人員之一，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書院的支持。<sup>③</sup>

隨着書院不斷發展，鄭觀應被邀請作為格致書院課藝命題人。他分別在 1893 年冬季和 1894 年冬季，主要圍繞時務和經濟分別出了七道題。在格致書院中，不但書院學生受到鄭觀應等人的維新思想熏陶，鄭觀應也受其學生觀點的啟發，真正做到了教學相長。多次獲得獎項的楊毓輝，因學業出眾而被鄭觀應邀請為《盛世危言》進行修訂並題跋，同時，楊毓輝的文章及其觀點也被鄭觀應收錄進《盛世危言》之中，楊氏的〈論泰西善堂〉一文就被附在〈善舉〉之後，〈釐捐〉裏則直接引用楊氏觀點。可見在格致書院中，鄭觀應不但將他的先進思想傳遞給學生，並且也教學相長，在與學生的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 （二）鄭觀應的英文觀

在英文方面，鄭觀應不但自身能熟練掌握及運用英文，並且也對英文教育十分重視。在實際運用方面，熟練使用英文成為了鄭觀應擴寬世界視野、積累西方人脈的基礎。除了早期在洋行的經歷之外，鄭觀應曾作〈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他在該文中從形體、音韻、難易等各方面對比了中文與英文的區別。此外，鄭觀應也與外國的傳教士、記者等人士保持往來。鄭觀應曾收到美國記者克利爾曼（James Creelman）來信，他在信中詳述了旅順大屠殺的慘況。鄭觀應收到信後悲痛欲絕，“傷心流淚，情不自己”，於是將克利爾曼的來信翻譯成中文，寫成〈中日交戰西文報記日兵屠城慘酷圖說序〉一文，並增加繪圖十二幅，編撰成冊，散發至人民手中，以佈告天下、傳之後世。<sup>④</sup>這都有賴於鄭觀應熟練的英文水平。

鄭觀應將有志西學者多、而可與西人相頡頏者少的原因，歸結於文字不通。在理解西方思想上，他認為雖然京師同文館、上海翻譯館等已有不下百部的翻譯著作，可不但在質量上“翻譯之書恆有辭不達意之患，似是而非之弊”，而且在數量上“今所譯者不過萬分之一耳”，<sup>⑤</sup>因此僅靠翻譯往往難以得其要領，還是需要培養熟練掌握英文的人才。面對無暇顧及洋文或視洋文為異端的學者，鄭觀應也從自身實際經歷出發，提出了振聾發聵的“當今之世，無論西學之不能不講，即一切華洋交涉之事亦日繁一日，苟其不明洋文，安能周旋於其間哉”的發問。<sup>⑥</sup>歷史也證明了，鄭觀應提出的“知洋文必將盛行於中國”的判

<sup>①</sup> [清]鄭觀應：〈譯英國報律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06。

<sup>②</sup>（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2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4—35。

<sup>③</sup>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78—284。

<sup>④</sup> [清]鄭觀應：〈中日交戰西文報記日兵屠城慘酷圖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86—488。

<sup>⑤</sup> [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84。

<sup>⑥</sup> [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85。

斷是正確的。<sup>①</sup>

雖然鄭觀應推崇西方教育制度、重視英文教學，但他在包容外來文化的同時仍堅守着中華文化。他雖然提倡重視英文學習，但是並不代表他認為可以放棄中文。相反，他批評“略識洋文，略諳西語，便詡詡然誇耀於世，以為中國文字學問不足學”的浮薄少年，並提出“必以我本國文字學問為始基，而後能融會中、西之學，貫通中、西之理”。<sup>②</sup>

雖然生在變化動蕩的年代，夾在中、西兩種文化之間，但鄭觀應並沒有被任何一種文化所完全支配。一方面，他在考試失敗後放棄了科舉之路，在一個思想觀念正在被形塑的年紀，以買辦的身份與西方人保持密切聯繫，並且跟隨傳教士傅蘭雅學習英文，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洋文與西學。另一方面，他接受過傳統教育，肯定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他深深地為中華文化而自豪，致力於改革科舉制度也並非出自對落榜的怨恨，而是在尋求可以改善國家的方式。儘管我們能看到很多掙扎，但兩種文化經過他自身的調整和適應，最終在他身上很好地呈現了出來。

綜上所述，早期來到上海時接觸到的寶順洋行與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夜校，二者都從不同層面形塑了鄭觀應對西學乃至西方文化的態度。鄭觀應並未像王韜一樣可以有機會遊歷西方世界，雖然他透過作品竭力推崇西方制度，但他從未踏足過他筆下的西方各國。因此，他對西方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所接觸的西方人士。鄭觀應多重身份及改革思想正是一種反映，即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所接觸的社會，都受到 19 世紀末中國的轉型以及對世界秩序的適應所產生的影響，而傅蘭雅對鄭觀應的教學正是影響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當鄭觀應站在古今中西交匯的十字路口迷茫之時，傅蘭雅不遺餘力地成為了他的西學啟蒙者。隨後，鄭觀應一生融合東西之學，成為引領西學東漸的思想先驅，傅蘭雅也逐漸在完成“西學東漸”後，轉向了“中學西進”的使命。如今，面對現代性帶來的傳統價值規範被瓦解、普遍有效的新價值規範未被建立的普世困境，鄭觀應與傅蘭雅這份跨越中西互相成就的交往，一定能為我們帶來啟示。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

<sup>①</sup> [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85。

<sup>②</sup> [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85。